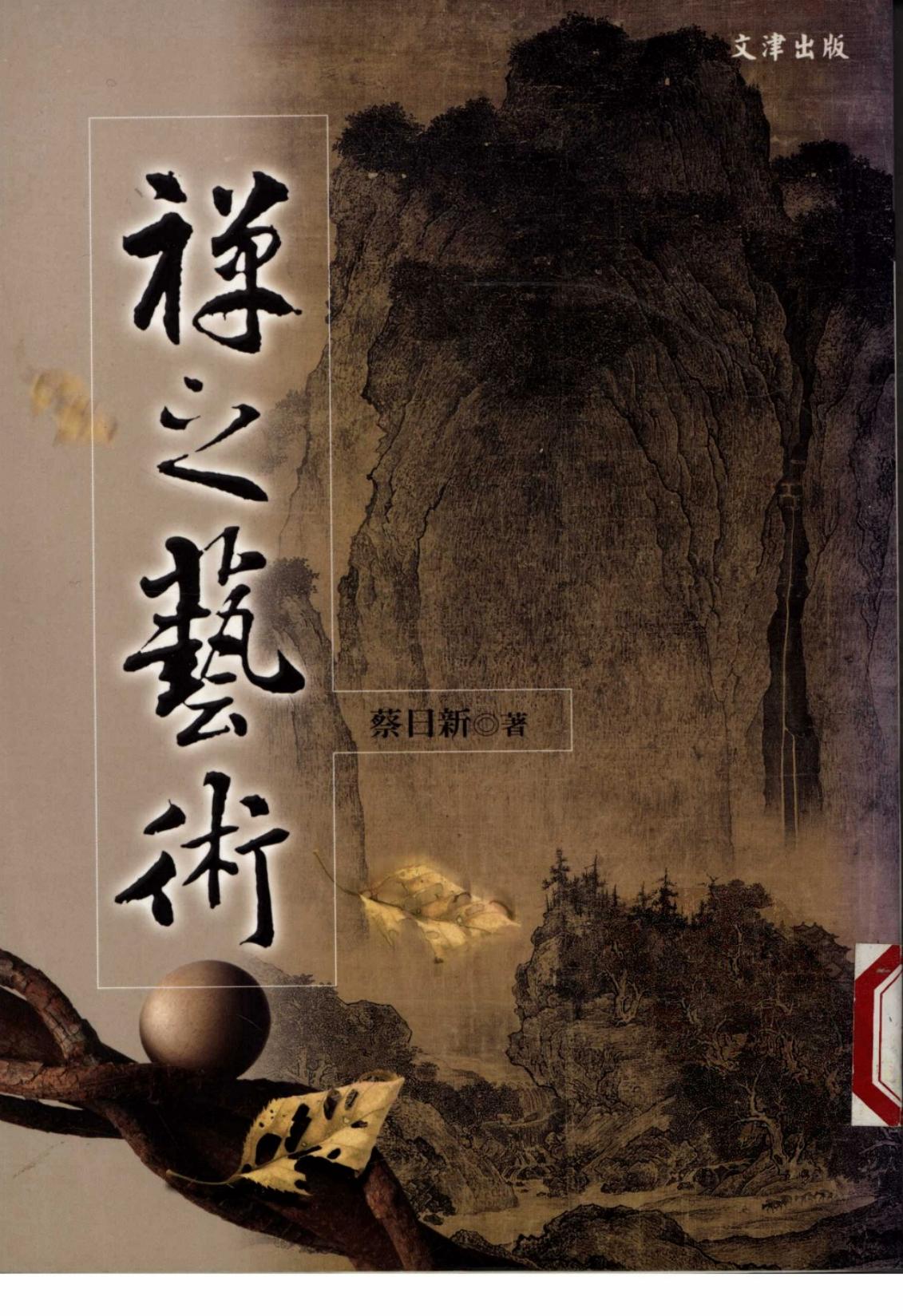


文津出版

禪之藝術

蔡曰新◎著



蔡日新 著

禪之藝術

蔡日新識



文津出版社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禪之藝術 / 蔡日新著. -- 初版. -- 臺北市：
文津，2002[民91]
面；公分

ISBN 957-668-670-9(平裝)

1. 禪宗 2. 佛教藝術 - 哲學, 原理

226.6

90022435

禪之藝術

著作者：蔡日新

發行人：邱家敬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106建國南路二段294巷1號

E-mail : twenchin@ms16.hinet.net

<http://www.wenchin.com.tw>

電話：(02)23636464 傳真：(02)23635439

郵政劃撥：00160840 (文津出版社帳戶)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5820號

初版：2002年1月一刷 印數：①～1000本

ISBN 957-668-670-9 定價：新台幣350元

PDG

自序

這本小冊子竣稿已近十年了。今天，重新鈔正，又回想起十年前的寫作情景了。

十年前，筆者被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約為「中國佛教文化小叢書」的作者。這對於筆者來說，自然是個修學的好機會，故欣然領命，隨後動筆選題撰寫。因這套小叢書要求找到佛教與中國文化化的某些切合點來作為選題，而竊以為佛教中國化因素最多的莫過於禪宗，而禪與藝術之間又有著許多不可分割的聯繫，站在哲學的理念上看，禪是一種至為圓滿的美學本體，故爾選定了「禪之藝術」這個課題。選題確定後，我利用寒暑假及星期天挑燈夜作，寒暑易節，三易其稿，方成此十萬餘言（由於當時約稿限定了字數）的小冊子。

禪的內涵是不落言詮的，藝術的至境同樣也只能意會，在禪與藝術之間存在著許多的切合之處，「禪之藝術」就是從這個方面來作了某些有益的粗淺探索。筆者認為：禪是藝術美的本體，而諸種美的藝術形式，則是禪旨向藝術的外化。站在這個立足點上，將全書分為九章：第一章可以視為全書的一個基本綱領，主要闡明了禪宗思想的成因及其真實、空靈、圓成的美學風格。第二至四章，分別就禪的教育、生活、語言三個方面來闡述，這些內容十分貼近於叢林生活，因而可視為該書中的內篇。禪的教學藝術一章主要討論了叢林教學的特點與方法，指出它具有自覺性、簡捷性、日常性等特點；禪門教學或引而不發、或語意雙關、或反常合道、或平常句下藏機鋒等。

無疑都是極為精湛的教學藝術。禪之生活藝術一章從禪師對社會財富、對日常作役、對大自然，以及對過堂、行腳乃至喫飯喝茶等方面展開了討論，說明了禪師的那種任運自如、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完全可以说是一種生活的藝術。禪的語言藝術一章闡述了禪門師徒傳心所用的語言藝術，這種語言具有通俗、簡潔、語義內涵豐滿等特點。第五至九章分別談了禪與唐宋詩詞、山水畫、書法、音樂、園林等藝術之間的關係，著重闡述禪之美學本體是怎樣向諸種藝術形式滲透的。由於以上五個方面，去叢林生活較遠，故可視為全書的外篇。但讀者可以透過這五個方面看到禪與舉凡藝術之間的密切關係，進而又從諸藝中見出禪之美學本體來。

禪之藝術即是美的藝術。因為，非但禪的合理內旨即是美的本體，而且禪門的日常修持本身就是一種生活的藝術。故爾受禪之影響的諸藝，也無不臻於上乘。

書稿完成後，即寄達北京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經專家通讀書稿，表示首肯，認為當「嘉惠後學」，付梓刊行。然因該所出版運作不力，故洽寶島刊行。作為在禪與藝術方面的探索，本書僅盼能作為引玉之磚，諸多欠妥之處，尚祈讀者與方家是正。

蔡日新 西元二〇〇一年

補識於長沙市興漢門外酌爽齋

禪之藝術 目錄

自序

第一章 中國禪宗思想的成因及其美學特質

第一節 中國禪宗思想的成因

第二節 佛性的自覺與文藝的自覺

第三節 禪的美學特質

一、空靈美

二、直覺式思維的真實美

三、藝術表現的圓成美

第二章 禪之教學藝術

第一節 禪宗的教學特點

一、努力激發學人的自覺意識

二、禪宗教育的簡捷性

三、禪宗教育的日常性

第二節 禪宗的教學藝術	四七
一、以意旨雙關的言行接引學人	四八
二、引而不發，釀造氛圍，以啓悟學人	五三
三、以悖乎常理的言行斬斷學人的情纏意鎖，使之開悟	六〇
第三節 各具特色的禪教宗風	六七
第三章 禪之生活藝術	七七
第一節 禪是在世間的出世間法	七八
第二節 禪的生活藝術	八〇
一、禪師與社會財富	八二
二、禪師與作役	八四
三、禪師與大自然	八六
四、禪師與雲水生活	八九
五、禪師生活的灑脫之樂	九〇
六、茶禪之趣	九一
第四章 禪之語言藝術	九五
第一節 公案的幾種語體	九六

目 錄

第二節 公案中人物語言的特點	九九
一、通俗性
二、簡潔性
三、語義內涵的豐富性
第三節 公案人物語言的藝術性	一〇七
一、一語雙關，囊括妙旨	一〇
二、設喻明義，意蘊圓滿	一四
三、反常合道，妙契禪旨	一七
四、寓莊於諧，旨歸高妙	一九
五、語工意新，韻味無窮	二一
第五章 禪與唐宋詩文藝術	二四
第一節 禪與唐宋詩詞藝術	二九
第二節 禪與唐宋散文藝術	三九
第六章 禪與中國山水畫藝	四五
第一節 禪畫藝術軌跡的探尋	五〇
第二節 打成一片——化境的追求	五五

第三節 象外之象——逸格的神韻	一六四
第七章 禪與中國書法藝術	一九一
第一節 禪書的蹤跡	一九二
第二節 學書與參禪	二〇〇
第三節 禪書的韻致	二〇四
一、禪書中的自然美	二〇四
二、禪書中的文學美	二〇八
三、禪書的繪畫美	二一一
第八章 禪與中國音樂藝術	二一七
第一節 禪樂的緣起	二一七
第二節 禪樂的風韻	二二二
第三節 禪樂對後世音樂藝術的影響	二二七
第九章 中國園林中的禪趣	二三三
補 註	二四五
附錄一 禪門悟道因緣舉隅	二六五

目 錄

附錄二
壹、禪學悟道與生命實存	二八二
貳、學理思考與人生境界	二八二
後記	二九九
	三三〇

第一章 中國禪宗思想的成因及其美學特質

在佛教諸宗中，最具中國特色的恐怕要數禪宗，對中國的思想與文化影響最深的，恐怕也得數禪宗。為此，我們很有必要對中國禪宗的成因及其美學特質作一番考察。

第一節 中國禪宗思想的成因

中國的禪宗相傳是在齊梁間經印度僧人達摩祖師東渡傳來的，《景德傳燈錄》及《五燈會元》均有記載，據《祖堂集》卷二所載，達摩祖師初渡東土時曾去找過梁武帝，當時的梁武帝未能放下承當達摩祖師的上上機鋒，他說：

朕自登九五已來，度人造寺，寫經造像，有何功德？

而達摩祖師的回答是「無功德」，因為「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由於梁武帝與禪法不對機，於是摩達祖師便渡過黃河北至洛陽，止嵩山少林寺，終日面壁禪坐。當時有位叫神光的僧人去參達摩祖師，達摩祖師起初並未立即接引他。直至神光立雪終夜，自斷左臂，達摩祖師認為他可以為法忘身，才傳法予他，嗣法為禪宗二祖慧可。二祖傳法三祖僧

璨；三祖有《信心銘》傳世，並付法四祖道信；四祖傳法五祖弘忍，旁傳牛頭法融（未得衣鉢）。自初祖至五祖的禪法傳承，均以《楞伽經》印心，並以衣鉢傳承表信。至五祖弘忍傳法六祖慧能，始改以《金剛經》印心，亦以衣鉢相傳。

禪宗自六祖以後，唯傳心法，不再以衣鉢相傳，宗風亦日趨自由靈活，由是宗門大盛，終於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禪門「五家七宗」。尤其是在會昌法難以後，華嚴、唯識諸宗一蹶不振，而禪宗以其活潑簡捷的方式傳法，終於成爲了中國唐宋時佛教中一枝獨秀的奇葩。

「禪」本是梵語中「禪那」的略稱，舊譯爲「棄惡」、「功德叢林」、「思維修」等，新譯爲「靜慮」。它作爲一種修持方法名爲禪定，意爲「心住一境，正審思慮」，爲六波羅蜜法之一。不特禪宗修持，其他宗門亦持此法，天臺之止觀，更是偏重此法的修持。而作爲禪宗的修持宗旨，並不全在於禪坐止觀，要在直指人心，見性明心。尤其是六祖慧能以後的禪宗，擺脫了佛教教義中繁瑣名相的纏縛，也不十分主張在坐禪的形式上多下功夫，因而將中國佛教的禪宗推向了一個嶄新的境地。就連六祖對坐禪的解釋也別具一格，他說：

此法門中，一切無礙，外於一切境界上念不起爲坐，見本性不亂爲禪。何名爲禪定，外離相曰禪，內不亂曰定。**①**

又云：

坐禪元不著心，亦不著淨，亦不言不動。若言看心，心元是妄，妄如幻故，無所看也。若言看淨，人性本淨，爲妄念故，蓋覆真如，離妄念，本性淨。不見自性本淨，起心看淨，卻生

淨妄，妄無處所，故知看者卻是妄也。淨無形相，卻立淨相，言是功夫，作此見者，障自本性，卻被淨縛。^②

慧能大師強調的是自證自悟，他認為「悟即元無差別，不悟即長劫輪回」^③，他不但強調自悟，而且倡導「頓悟」，他認為「一念愚即般若絕，一念智即般若生」^④。由於六祖的頓悟法門具有許多優點，故其門下一時僧徒雲集，並出現了像南陽慧忠、永嘉玄覺、荷澤神會、青原行思與南嶽懷讓那樣的高足，經青原、南嶽兩系再度弘傳，則發展為七宗。

關於禪宗的法嗣，《景德傳燈錄》尚有七佛與西天二十八祖之說：《人天眼目》卷五的《宗門雜錄》中，亦收有王安石告訴慧泉禪師他在翰苑所見的《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一事，然此僅王安石見之。其內容如下：

梵王至靈山，以金色波羅蜜花獻佛，舍身為床座，請佛為眾生說法。世尊登座，拈花示眾，人天百萬，悉皆罔措。獨有金色頭陀，破顏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分付摩訶大迦葉。」此經多談帝王事佛請問，所以祕藏，世無聞者。^⑤

王安石所見的這部經在宋代禪門的燈錄中，已成了禪宗信史。各本語錄均收有「拈花公案」，均認可世尊的「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的付囑。世尊傳法給大迦葉，《大般涅槃經》、《大智度論》諸經論確有記載，獨於「拈花公案」，僅王安石見之。若從中國佛教發展的規律來看，中國禪宗的產生與發展，是有它一定的宗教理論與宗教實踐發展基礎的，它是一定的宗教理論與宗教實踐發展的必然產兒。

綜觀《壇經》一書，我們可以知道六祖禪法的理論基礎不外乎「般若」與「涅槃」這兩個佛學思想體系。首先，慧能大師的發心是始於《金剛經》的。《壇經》載慧能大師未剃度時於市賣柴，「忽見一客讀《金剛經》，惠能一聞，心明便悟」，這便是大師出家的緣起。其次，五祖弘忍在向慧能大師傳法印心時，也是用的《金剛經》，《壇經》所載五祖於三更時喚慧能至堂內說《金剛經》，即是其證。此外，一部《壇經》，充滿了般若思想，諸如「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摩訶般若波羅蜜最尊、最上、第一，無往、無去、無來，三世諸佛從中出」，「我此法門，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慧」等語，在《壇經》中幾乎俯拾即是。本來，「般若爲諸佛之母」，如果離開了般若之慧的觀照，人們便無法悟入佛的境地。

《壇經》的涅槃思想還體現在它對佛性論的闡發上，這也是貫串於全經的一根主線。六祖將佛性稱之爲「自性」，他認爲「萬法盡在自性」，又云：「自心即佛」，他甚至認爲：

三世諸佛，十二部經，亦在人性中本自具有。⑥

正因爲佛性是人們所共具的種子，因而人們一旦認識了自性，即使頓悟了佛境，這也是慧能大師頓悟說的立論依據。

其實，慧能大師的這兩種思想體系的形成，完全是對魏晉以來中國佛學思想的融通和總結。東漢永平年間，佛教伴隨著絲綢路上的駝鈴聲傳到了中國，但當時的中國正是儒家經學盛行之時，今古文經學的論爭方興未艾，中國的知識分子潛心於文字訓詁之中，對於西域傳來的這門博大精深的學問卻乏人問津。即便是當年牟融曾就佛學寫了一篇〈理惑論〉，也只是認爲「道者九十六

種，至於尊大，莫尚佛道也」^⑦，牟融不只是將佛教視為一種道術，且認為「佛」只是像三皇五帝那樣一類的謚號。到了魏晉時期，經學漸衰，繼之而起的是崇尚黃老之道的玄學。由於政治思想的禁錮漸鬆而導致了哲學的解放，佛教的般若思想也便伴隨這一時代思潮而興盛地弘傳開來。許多高僧援引玄學思想來闡發般若義蘊，例如即色宗大師支道林就常借用《莊子·逍遙遊》來闡發般若思想。一時講解般若之風盛行，六家七宗相繼出現，它們是佛學與玄學兩種思想相互滲透的產物。直至羅什大師重譯般若經論與龍樹的《中論》等佛典，僧肇等依經作論之後，般若學才徹底擺脫老莊玄學思想的影響，正式顯現出其性空的本來義蘊。

由於般若性空思想比老莊哲學更為深邃細密，以故當時許多學者由玄學轉入了對般若學的研究。足見，魏晉是般若學的黃金時代，般若學與中國的老莊思想的相互滲透，也是佛教走向中國化的一個良好開端。

對涅槃思想的闡發盛於東晉末期，道生法師在這方面的貢獻是十分卓著的。東晉義熙年間，法顯大師所譯的六卷本《泥洹經》南傳，經中主張一闡提不具佛性，而道生大師認為一切蠢動含靈皆具佛性；一闡提既屬有情，就當有佛性，由是而作《佛性當有論》。誰知這一正見卻在建康一帶叢林中引起了軒然大波，那些滯守經文的僧眾認為道生大師背離經論，有違戒律，並以此罪名將他逐出建康。直到北涼曇無讖譯出的四十卷本《大般涅槃經》南傳，經中果然談到了一闡提可以成佛，京師建康諸僧才「內慚自疚，追而信服」，認為道生大師是「孤明先發」。由於佛性論的確立，在解脫論上的頓悟成佛義也便得以成立。生公此二說的創立，將格義的佛教引入了向人的内心深層次的修養，開創了中國佛教思想發展的新紀元。《壇經》正是對這兩種思想體系的

繼承與完善，也是對六朝以來中國佛學思想最完全的總結。站在這角度上講，我們將六祖的禪學思想溯源到魏晉時期，亦未嘗有大過。

第二節 佛性的自覺與文藝的自覺

魯迅認為：

魏晉時期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前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的一派」。⁸

的確，兩漢文學是一種「助人倫，成教化」的功利性很強的作品，縱然當時尚有清新活潑的樂府詩問世，但那仍只屬於民間文藝的範疇，雄冠兩漢的《史記》也畢竟只是為史而作的雜文學，司馬相如、東方朔等也只能充當漢武帝的弄臣。究其原因，主要是統治者對思想與學術的禁錮所致。

漢武帝的「獨尊儒術」，將先秦時那種百家爭鳴的活潑學術氣氛一掃而盡，繼之而佔領文壇達近四百年之久的是鑽入故紙堆裏的經學與小學。到了魏晉時期，被罷黜的百家可以為人們所探究，在學術上也沒有皇家欽定的標準的約束，故爾文人思想比較活潑。於是，「一種真正思辯的、理性的『純』哲學產生了；一種真正抒情的、感性的『純』文藝產生了」⁹。可見，魏晉以來的文學自覺是產生於人的自覺這個基礎上的。

魏晉時期，人的自覺主要體現在思想與哲學的解放上，人們開始對宇宙的本體和人的本原作潛深的探索。在這一方面固然當首推王弼、何晏等人開創魏晉玄學的首功。但更不能忽視另一個

引人注目的歷史事實，那就是佛教的般若與涅槃兩大思想的引入，大大地開拓了時人對宇宙與人生認識的廣度與深度，使中國本土的哲學增強了思辯性。般若學講空觀，有助於人們正確地去認識宇宙的本體；涅槃學講佛性（有），有助於人們去追尋其自性。這兩種佛學思想體系盛行於魏晉與劉宋，既體現中國哲學思想發展的歷史性必然選擇，同時也是佛學的東傳在中國找到了與其思想文化相融合的歷史契機。

就魏晉時的老莊學說而言，它較之般若思想的精義畢竟是有一大段距離的。老子認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¹⁰。它這個「道」是周賅萬物而又不可言說的（「道可道，非常道」）。到了淮南子作《原道訓》，一連用了好幾十個否定句說「道」，卻未能立下一個準確的義界。老子的「道」是尙虛無的，他認為「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因而，他極力主張棄聖絕智，「塞其兌，閉其門」¹¹，通過虛靜的冥想去直覺萬物。這種思想對後世的禪學頗有些影響，馬祖門下的洪恩禪師就向仰山說了個「六窗一獮喻」¹²，六祖的《壇經》亦云：

常淨自性，使六賊從六門中走出，於六塵中不離不染，來去自由，即是般若三昧。

莊子繼承了老子的「道法自然」思想，他認為道是無限的「自本自根」，因而無所不在，而這個「道」又是先天地而生的，是無有差別的，因而他又提倡齊物我、等是非，以達到「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齊一」的境界。到了魏晉時期，何晏援老入儒，主張「天地萬物以無爲本」，天才少年王弼注《周易》、《老子》諸書，提出了天地雖大，「寂然至無，是其本矣」之說，也就是說「無」是宇宙的本體，萬有皆生於無。由於何、王等人在哲學上極力倡導「本無」之說，